

潘承玉 著

清初诗坛： 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中华书局

ZHONGHUA WENSHI XINKAN



“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而卓尔堪及其所编辑的《遗民诗》既是清初诗歌暨遗民诗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亮点，又几乎是迄今为止的清初诗歌暨遗民诗歌研究的一个盲点。本书征引文献和论文近千种，考论结合，文史兼顾，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卓尔堪及其遗民朋友，研究了《遗民诗》的编辑控制及其版本、文本等内容，对明清之际的诗歌嬗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卓尔堪及其《遗民诗》之所以成研究盲点的原因，并揭橥了其文学史地位，是一部对卓尔堪及其《遗民诗》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专著。

中华文史新刊

清初诗坛：卓尔堪 与《遗民诗》研究

潘承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潘承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4235-X

I. 清… II. 潘…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清代②卓尔堪-人物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407 号

书 名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潘承玉

责任编辑 林玉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¹/₈ 字数 351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35-X/I·553

定 价 32.00 元

序

承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索序于我，师生情谊，不容推却，我应允了。

承玉是鲁迅故里绍兴文理学院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副教授，1999年，千里迢迢，考取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毕业，又南下羊城，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师从吴承学教授，继续深造。

在报考北师大研究生前，我与承玉素不相识，只在有关论文目录中知道他的名字。1998年冬报名后，他给我来过一信，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引起我注意，他说：“被不少新花样迷惑了一阵之后，很多后学越来越神驰于汉学功夫，我就是这样一个后学。”于是，我揣想，承玉当是一个对治学之甘苦有过深切体味的青年。随后，他给我寄来了他的学术专著《金瓶梅新证》（黄山书社1999年1月版），我匆匆拜读一过，感到承玉此书，虽只是为一种“旧说”作一“新证”，但他注意把文学考证与历史考证结合起来，论定徐渭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在《金瓶梅》作者众说纷纭的“金学”界，他的这一结论，未必能成为共识；但他所表现出的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谓“汉学功夫”非虚语也。于是，我又想，如果考试成绩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合格，我是愿意录取他的。后来，他果然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取了。

在三年读博期间，他勤奋好学，发扬其朴实学风，一方面，继续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取得一系列成果；同时，又努力拓展研究领域，把主要精力逐渐集中于明清之际文学的研究方面。因为，在他看来，“尽可能穷尽文学史的一切重要真相，把小说、戏曲与诗文打成一片进行研究”，“是构建完整文学史图样的必需”。这样，便渐渐形成他自己的—种学术志趣，—种研究思路。

但是，无论如何，尊重证据，尊重事实，不尚空谈，是承玉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三年学习中，他撰写发表的十多篇实实在在的论文，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史”课的学习，他写了三篇系列文章。其中《八卷本〈搜神记〉成熟时代新考》—文（刊发于中华书局《文史》2000年第4辑），对—般认为该书系“明末伪托本”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而依据唐代敦煌文献、《大藏经》等多种资料，判断它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作品；《佛家“论议”、“说话”考——古代通俗小说之源》—文（发表于《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首次揭橥了晋宋以来特别是唐五代时期佛家的“论议”、“说话”活动，剖析了其在通俗小说起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古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和繁荣论证了一个新的源头，均不失为—家之言。还有，在学习完“元明清文学专题研究”课后，他又写了两篇论辩性的长文，尤显示出他为搜寻证据、追求真理而不遗余力的探索精神。如其中—篇《〈随园诗话〉涉红材料真伪新考》（2001年刊发于韩国《国际中国学研究》第4辑），为理清《诗话》版本，他跑遍了在京的各大图书馆，并前往袁枚生前居住地，查访了南京图书馆，得以亲见此书从乾隆至民国的近30种版本；同时又翻阅了大量有关曹

寅、袁枚等的家世、生平、交游的史料、文集、笔记，爬疏排比，慎思明辨，而后指出，《诗话》之涉红记载，有四“不可信”，这对澄清红学史上的某些重要疑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披览承玉这些论文，每每使我欣慰地联想起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的话：“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承玉的学术追求、研究思路、治学态度，更集中体现在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中。

起初，他的意愿，是写一部《南明文学史稿》。因为，有的学者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夹缝人生和边缘状态心灵激情的产物”。承玉赞同这种观点，并以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艰难的士人的人生夹缝，就是明清易代之际；最边缘状态的士人心灵，就是入清不仕的明末遗民”。所以，撰写一部《明遗民文学史》或扩而大之写一部《南明文学史稿》，就成为他一个越来越明晰的学术追求。为此，他已低首苦读了一批明清文人别集和笔记史料、方志、年谱，积累了大量资料，并有了一粗略的构想。但学习认真的他，继而又觉得，三年时间，实实难以尽阅数以千计的明末遗民之存世著作，实实难以理清弘光、隆武、鲁王、永历诸朝士人行迹错综紊乱之复杂关系，于是，改而选择“卓尔堪和他的《遗民诗》研究”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以此为突破口，研究卓尔堪及其遗民朋友，研究《遗民诗》及其所收数百名作者，并进而研究更多的遗民及其同道，如此做去，将来《南明文学史稿》或可成之有日。

应该说，论文的难度和工作量，都是相当大的。两年多以来，为查阅资料，他东奔西走，京城各大图书馆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并利用来回浙江和寒暑假之便，走访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除翻检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等大型丛书外，他还查阅了单刻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不下千种，抄录、复印、扫描的资料，放到一起可整整装满一大纸箱，这些，都为他论文的写作做了充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

论文答辩前，先送有关专家，进行评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其选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填补了明清之际诗歌研究的一项空白”。后来，答辩委员会决议又说它是一篇“考论结合，文史兼顾”、“深具创见和工力的优秀博士论文”。

别不多言，这里，仅就其所考内容，姑举两例，以见一斑。

如卓尔堪其人，他本是康熙时期著名人士，其诗作，自康熙至嘉庆，也颇受赞誉。但自嘉庆之后，人们对他实际又知之甚少；有的记载，也歧义百出。论文第二章卓氏年谱，采用传统方法，细致胪述了谱主尔堪一生主要事迹；而第一、三两章则详细考察其家世、交游，如此，与年谱合为一整体，相辅相成，完成了尔堪其人的全面研究，被专家称之为卓氏研究之真正“拓荒之作”。

再如，关于《遗民诗》的版本，自清末民初，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有关书目文献与专著论文，都把十六卷本当作尔堪康熙原刻本。版本梳理不清，直接影响到对《遗民诗》思想和艺术的认识、评价。承玉论文，专列《遗民诗》“版本研究”一章，经过细密考辨，查明十六卷本实际都是雍正间刻本，是对十二卷本改版加工而来，而十二卷本才是康熙件原刻本，澄清了长期流行的一种误解。并实事求是分析了两种本子的关系，指出十六卷本人选的诗人，由原有的317人，增至整500人，是其贡献；但十六卷本，通过改版，在很大程度上“悄悄颠覆”了原刻本的遗民民族气节，背离了十二卷本的“编辑旨趣”，则是其明显缺陷。这一认识，也得到诸位专家的肯定。

疑而后考，“考而后信”（胡适语，出处同上），这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我想，这也是承玉所以能够在短短三年中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也完全相信，只要他继续走自己的路，坚持这种朴实学风，发扬创新精神，他一定会取得更大成绩。我期待着。

张 俊

2003年7月16日于北师大

序

人们的态度与立场是评价事物的关键。同一事物,由于观察者的态度不同,便会有激赏者,亦会有贬抑者。比如对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遗民——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他们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古人大体上是以为之崇尚气节的典范,司马迁《史记》载有《伯夷列传》,韩愈特地写了《伯夷颂》,而毛泽东则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他以伯夷、叔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旧王朝的死硬派。同一伯夷、叔齐,誉之者谓之为坚贞守节的典范,贬之者嘲之为顽固迂腐的象征。可见迂腐和守节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或者说,它们本是一个词,只是由于言说者立场不同,便各自读出褒义与贬义来。

凡有朝代更替,便有遗民。在商周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遗民群体的出现,当以宋元之际的宋遗民,特别是清初的明遗民最具代表性了。明清之际中国发生了惨烈的社会变故,明王朝的汉族政权被满族的清王朝所取代。清初乃至相当长时期内,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晚明有一批臣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决不妥协,坚决抵抗,其惨烈悲壮与其规模宏大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之程度，实在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在当今中国的读书界或研究界，随着儒学失去地位而代之以各种新主义、新思潮，评价体系、价值判断日益多元化以后，这些在传统话语中向受尊敬的遗民人物，人们的评价更难以统一而出现褒贬的二极对立。比如，他们的忠诚于旧朝，是气节高尚、义薄云天的忠臣之举还是不识权变、逆潮流而动的匹夫匹妇之小忠小谅？他们的抗御清廷，坚决不与清廷合作，至死不屈，是取义成仁的志士之为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无谓牺牲？那些投顺新朝的官员，是可耻的“贰臣”还是一帮“良禽择木而栖”的识时务的俊杰？这些恐怕都是见仁见智的（在这方面，互联网上的争论要比在传统纸质媒体上热闹、尖锐、激烈得多，而且更真实、更快捷地反映出年轻人的想法）。

复杂之处还在于，对于遗民的评价绝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还杂缠着政治需要与民族政策，学术问题遂成为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比如某些教科书便认为历史上的所谓民族之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近来颇受海内外关注的所谓“岳飞是否民族英雄”之争便是对这种观念的争论。

除了当下的政治影响与道德评价之外，文化视野的影响也在起作用。20世纪西学东渐，21世纪据说更是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清初明遗民研究眼光和立场就更显多样了。

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看，或者从那些自以为已是或将是“世界公民”的人的“开阔”胸襟和“超然”眼光来看，所谓的民族传统与爱国主义是否有价值当然是有疑问的，而明遗民所耿耿于怀、痛心疾首的“亡国”也好，“亡天下”也好，恐怕也仅是“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不足大惊小怪。

同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近年清初明遗民极受海

内外学界的青睐,原因很多,其中有些学者是因为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迫,在心态上觉得就像中国文化的遗民。于是对于清初明遗民便产生共鸣,心有戚戚焉。有些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明确表明自己是抱着反抗西方文化、保存传统文化的志向来研究清初遗民的。

这是两种绝不相同的价值观。我想,应该允许学术的自由与多元化。研究者想以“文化遗民”的心态去研究清初的明遗民,以表现保持民族文化的志向,当然可以;研究者想与时俱进,以全球化的眼光或世界公民的心态来审视和评价几百年前的事件与人物,那也无妨。

我想对待历史,大体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一种是从当下语境的需要出发,重估一切价值;另一种是通过还原历史的语境,尽量接近和理解过去的人物与思想。前一种的目的在于从现实出发去评价历史,而后一种的目的则在于理解历史。当然评价离不开理解,理解亦非全无评价。我无法判断两种历史研究言说方式之高下。就我本人来说,则更倾向于对于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方式。我以为了解应先于且高于价值判断,甚至以为学术研究可以先搁置价值判断。陈寅恪先生提出历史研究要达到对于古人的“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原则早为学界所熟，甚至可以说是学术界的“老生常谈”了，但是，真正在研究中体现出这种精神尚不多见。

潘承玉博士的学位论文就是研究清初遗民诗的，最近即将出版，索序于余。我读《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该书也非常强调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不过，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我更欣赏的是作者在前言中强调的“文献考证获真知，是论文的基础，文本赏鉴求审美，是论文的归宿”。我以为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者这种学术追求。

在现有的文学史研究中，卓尔堪不太为人所熟悉，《遗民诗》也知之不详，研究相当薄弱。本文首次全面研究了卓尔堪的家世变迁、生平行履和交游情况，考辨揭示了卓尔堪及其一批遗民友人的大量史实；首次依据众多善本文献，梳理出《遗民诗》版本演变的轨迹，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遗民诗》版本的错误，考察了《遗民诗》成书的社会文化成因和编辑控制，特地研究了当时大量出现的历代“遗民录”的编撰与流传，以及诗坛当代人选当代诗的繁荣情况，广泛地论及清初明遗民的种种心态和诗坛风尚。从一个人看整个群体，从一部书考察一种思潮，从对一个诗人和一部选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初明遗民的士心与诗心，这是《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的主要内容。由此揭示的大量史实，为我们提供了清初明遗民生活状态与心态的真实背景，使我们比较容易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这对于我们“了解”在那个特殊时代里，卓尔堪的《遗民诗》“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显然是有助的。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而对于历史的评价，却是随着时过事迁，而言人人殊，如白云苍狗，变化莫测。对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是追寻历史真相。这就要重建一种历史存在情境和社会生活情境，为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历史真相与先人感情提供坚实的基础。当然历史的真实不可能绝对还原，但是与先入为主或从某种需要出发去重构、重估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潘承玉博士的《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还原历史语境，尽量接近和理解历史真相的方法：抛开成见，从文本与语境出发，去把握真相，去理解和体会古人的精神。正因为本

书提供了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所以我在读书时,常常掩卷而“神游冥想”,默默地体会着这些明遗民在当时的悲剧性心态,他们的痛苦和悲凉,他们的希冀与绝望。他们为了保持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尊严与情操,或在穷乡僻壤,或在喧嚣城市,无论面对着名利的诱惑,还是面对着斧钺的威胁,都不惜用自己整个的青春与生命,执着地坚守着。不管在当今这个时代聪明的人们会怎样看待和评价他们,我对此仍充满敬重钦佩之情。孔子评价宁武子说:“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的“愚”,实际上乃明哲保身的策略;明遗民之“愚”是成仁取义的节慨。相较而言,宁武子的“愚”,可及也,明遗民之愚,不可及也。

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清初在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形成一种规模宏大的遗民文化,但其中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者,可能是清初的遗民诗。近年来,清代诗歌尤其是清初诗歌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已有不少的论文与专著出版,但是对于“遗民诗”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至于从诗史审美的角度研究遗民诗对清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是空谷足音。潘承玉博士的研究还表明,清初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其中性情一派主要就是遗民诗人。他们在政治上不愿向新朝低头,在艺术上也独立不阿。以清初遗民为主导的性情诗派,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规模上,事实上都成了清初诗坛的主流。在此背景下,卓尔堪与《遗民诗》的文学史地位也就自然明朗了。

潘承玉博士的研究是相当有特色的。在清初灿若群星的诗人群体中,卓尔堪仅仅是一个普通布衣诗人和选家,而在当代,卓尔堪是差不多已被学术界遗忘的历史人物。潘承玉博士慧眼独具,以这位似乎很不起眼的角色作为研究中心,从小见大,不但考察了清初遗民诗派整体特征,而且论述了从“遗民—性情”诗派到袁枚性灵派这一诗史运动的内在联系。这些研究以新观

点和新视野展现了清初诗歌的新景观,勾勒出清诗发展的新线索,对于清初文学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我想,这正是本书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主要价值。

吴承学

2003年8月于中山大学

引 言

以第一、第二产业劳动者为基础的政治革命时代的结束和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及民众生活中地位的日益突出,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分子自我关怀色彩明显增强,反映到古典文学尤其是距今不远的元明清文学研究中,就是以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的诗学研究一改落寞沉寂的面貌,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本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文学史著作所传播的主流观念都认为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为小说和戏曲,诗歌作为封建士大夫文学的正统样式受到了长期的轻视。检点一下有关元明清文学的研究人员和论著的规模与数量,不难发现,从事有关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研究的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而从事有关诗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相对于此前已经长盛至久的诗歌样式,小说、戏曲当然是新兴的体裁,文学史研究给予新兴体裁以更多关注,自在情理之中;何况相当多小说、戏曲至今尚是广大民众阅读欣赏的对象,对小说、戏曲的研究与当代文学文化建设的关系显然也更密切一些。但是,文学史研究的终极目的,都是尽可能穷尽文学史的真相。对小说、戏曲研究过分热情势必忽视和淡漠有关诗歌等抒情样式的文学史面貌,这既难以完整再现文学史发展全貌,反过来也影响对小说、戏曲研究的深入。因为归根到底,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并不是各自截然分开、独自演进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

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

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文学史的生态系统的;离开这个系统中其他文学样式的影响、烘托和参照,人们也很难准确地把握小说、戏曲的发展规律和明确其中某些作品文学质量的高低。更为重要的是,元明清时期从事诗歌等传统抒情样式创作的士大夫数量之众、作品结集之多,是小说、戏曲远远不能相比的。如果把从事某种文学样式创作人员数量的多少定为这种文学样式是否为文坛主流样式的标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元明清时期的主流文学样式仍然是诗歌。根据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和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的调查,光是现存的清代诗歌别集就有七千种左右;而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与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含文集在内,均著录现存清代别集一万九千馀家、四万馀种。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古典文学特别是元明清文学研究开始扭转偏重小说、戏曲的倾向,而日益重视诗歌的研究,有关诗学的话题日益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这既是知识分子自我关怀情结向历史的一种回顾投射,也是对文学史原貌的一种更切实的逼近。海峡两岸的专著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年初版,1986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0年再版)、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等,都展现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绩。

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一个文学、学术发展的重要现象业已被揭示出来并得到日益多的体认,那就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学术是整个古代文学、学术的发展的极少数几个关键转折点之一。

刘梦溪先生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都是天崩地裂、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初看起来，明清易代似乎与春秋时期以及清末民初大有不同。实际上明清之际文化裂变的深度和烈度，丝毫不让于另外两个时期，而就学术思想的嬗变而言，还有其他时期不可比拟之处。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变化，更隐蔽，更婉曲，更悲壮。如果说先秦诸子和晚清各家是用舌和刀、纸和笔来表达思想，那么明末清初的知识阶层则是用血和泪来书写历史的册页”，“明清易代既是我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理解华夏学术思想嬗变的一个枢纽。”^①这是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而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史与学术史具有一体二面的关系。陈伯海先生从文学史的角度直接指出，“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三次高潮，它们都发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前两次在周秦之交和唐宋之交，分别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开始和士大夫正宗文学的全面成熟，“第三次则在明清之交”，“整个古典文学到了总结的阶段”，三次高潮都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变革，正是大变革的时代，促成了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和繁荣。^②这两位先生看法不尽相同，却不约而同地都把明清之际作为他们考察的重点之一，凸现了这个时期在整个古代文学、文化发展上所起的枢纽作用。所谓历史分节点，所谓转折时代，也就是前后两个时代边缘的交接，而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都表明，“文学总是与失意者、与边缘感受在一起，边缘是

①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26日。

②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页1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